

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研究

重构家计：转型社会的 家庭研究理路

刘新宇

【摘要】“转型社会”对于家庭研究的意义何在，是长期被学界所忽视的问题。一直以来，中国家庭研究对于转型社会有着两种彼此疏离的认识，一是聚焦国家与市场对家庭的冲击与依托，二是关注个体于家庭的脱离与回归。追溯并考察卡尔·波兰尼的经典转型社会理论，《巨变》中存在着一条关注家计的叙事线索，表现为个体命运因为家庭的瓦解，而同国家与市场的隐显关联为整体的研究命题。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促使家庭的外部世界与内在秩序发生转型，家庭展开了再制度化。学界重拾对家计的关注，研究命题逐渐分离为“国家—市场与家庭”以及“个体与家庭”。家计的重构催生了家庭研究对于转型社会认识的分野。

【关键词】转型社会 家庭研究 波兰尼 家计

(中图分类号) C91-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52 (2018) 06-0024-09

“转型社会”对于家庭研究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长期被中国学界所忽视的问题。作为20世纪兴起的社会理论，西方学者曾赋予“转型”以丰富的时空内容，用以描述复杂社会的变迁轨迹与结构状态。近些年来，转型一词在国内社会科学领域被高频使用，广大研究者出于各自的研究旨趣，创作出众多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却也无意中陷入了较为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不少学者已然将转型社会定义为一种无需多言、心中既明的背景知识；另一方面，不同研究领域对其的理解差距却在逐渐拉大。这个矛盾在中国家庭研究学界更加微妙，转型社会不仅仅是一种学术语言上的修辞，还融入到知识发展的命题与路径当中。遗憾的是，尽管优秀的经验研究层出不穷，但针对转型社会的理论反思却并没有与之匹配，不仅掣肘了跨学科的交流，更为政策研究以及实务的探讨增添了障碍。立足于不同的论述，本文试图厘清家庭研究学者对转型社会的不同认识，并进一步分析与探讨造成分歧的内在成因，从一个侧面展现家庭研究发展的理路。

一、家庭研究对于转型社会的两种认识

(一) 国家—市场对家庭的依托与冲击

家庭研究学界对于转型社会的一种认识源自对家庭形态变迁的思考。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

逐渐形成了一种基于“国家—市场”二元的“依托与冲击”转型社会认识。其中，“依托”指在家长制延续的传统下，国家的支配力量依靠家庭单位进行运作。“家国同构”的叙述逐渐成为这种路径的理论视角，国家在更大的范围内重复家庭的构想，家庭又为国家的无上性提供了首要的支持。“家国同构”既是一种政治治理模式，亦是一套政治伦理。^① 1986年，白威廉最早运用地位获得模型，考察计划经济时代家庭成分与父亲职业等先赋要素的作用，揭示了中国社会家长权威逐渐弱化的趋势。而在魏昂德的“依附理论”中，单位接替传统中的父权被赋予家长特点，城市家庭在经济、政治和人际关系上仰赖工厂单位的分配功能。^② 相应地，在中国农村社会，家本位观念也被一种“庇护主义”所取代：农民走出土地与亲族关系，转而依靠党员干部主导的基层政权组织。^③ 可以认为，上述研究的旨趣影响着当前家庭研究的议题讨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家庭所处的环境发生转变。然而，无论是对转型期的代际关系与性别问题的考察，还是考量人口政策驱动的生育话语转变，家国同构的视角仍然在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比国家角色稍晚进入人们视野的是市场因素，它被中国家庭研究学界关注则受到欧美社会分层研究带来的启发，“冲击”的研究路径逐渐形成。这一路径立足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着重关注市场经济冲击带来的社会问题。起初，家庭结构的嬗变并非转型研究者所尝试解决的首要议题，而是被看作解释这一过程的前提变量。倪志伟借鉴了波兰尼关于人类经济模式的分析，他的“市场转型理论”（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断定中国社会的转型乃是由经济体制转变引发的。^④ 人力资本较之过往的政治资本，将会创造更多的经济收益。市场转型论在美国学界引发了持久论战，家庭本身逐渐走向了转型社会研究的前台，“林南提出了一个强调社会文化力量的研究视角”。^⑤ “地方市场社会主义”（Local Market Socialism）理论认为，单纯的市场力量难以对地方政治生态形成根本冲击，再分配权力的生成只有依靠家庭与亲属网络，方能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发挥效益。^⑥ 林南引领后继学者对家庭收入、家庭背景等特征进行测量与调查。而与此同时，家庭调查工作在中国也日臻成熟，研究队伍愈发庞大。^⑦ 此时学者们的关注点，一方面在于伴随城乡结构变迁而显露的诸如留守儿童、妇女与社会流动等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与之匹配的政策探讨也在增多，在不同层面开展教育、医疗以及养老等政策的评估，讨论由此拓展到其他研究领域。

（二）个体于家庭的脱离与回归

家庭研究学界对转型社会的另一种认识在于，现代人的家庭观念与认识的转变。相关讨论虽然集中于近些年，但经验与理论已日臻成熟，学界已然形成了一种基于个体经历的“脱离与回归”研究路径，这一路径源自现代性探讨下的个体化理论。随着家庭观念的传统与现代之辩，已渐被“观

① 关于家国关系视角的开拓性研究，参见蒋永萍：《“家国同构”与妇女性别角色的双重建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社会的国家与妇女》，《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1~6页；陈映芳：《国家与家庭、个人——城市中国的家庭制度（1940—1979）》，《交大法学》2010年第1卷，第145~147页。

② Andrew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 14—15.

③ Jean Oi, *Communism and Clientelism: Rural Politic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vol. 37 (2), 1985, pp. 262—263.

④ 倪志伟的理论所参考的主要变量包括“家庭组成因素”以及“家庭收入”。参见 Victor Nee,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4 (5), 1989, pp. 663—681.

⑤ 参见陈那波：《海外关于中国市场转型论十五年文献述评》，《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3期，第190页。

⑥ 参见 Nan Lin, *Local Market Socialism: Local Corporatism in Action in Rural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4 (3), 1995, p. 340.

⑦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杨善华、沈崇麟、徐安琪等学者在国家支持下先后开展的针对婚姻家庭变迁的“五城市家庭调查”、“七城市家庭调查”，促进了中国家庭社会学队伍的发展与壮大。

察与理解家庭变迁的实际过程”所取代。^① 经由一个系统的“脱嵌与再嵌入”模型，个体化理论试图打破家庭给大众留下的刻板印象。“脱嵌”指个体从外在在社会约束中脱离出来，其中家庭建制与血缘纽带被视作束缚自由的关系桎梏；而“再嵌入”指个体获得自主权后，通过自我界定反过来投入新的整合形式与控制形式。^② 在对这一模型的本土考察中，阎云翔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开拓。他立足中国社会现实指出，“中国的个体为了寻求一个新的安全网，或者为了再嵌入，被迫回到家庭和私人关系网络中寻求保障，等于又回到脱嵌伊始的地方”。^③ 福利制度的缺位导致个体被迫回归家庭，个体化在中国依旧还停留在初始阶段。这种从个体境遇理解社会转型的研究倾向，有效地推动了经验研究的进展。在沈奕斐针对上海家庭结构与流动的研究中，“个体家庭”即指以个体为中心，受制于社会条件而代际关系紧密的家庭模式。^④ 尽管外部的制度因素依旧发挥重要作用，但个体在家庭中的地位与作用仍是其关注的重点。

个体化理论旨在揭示个体在家庭中的状态，而新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则为观察个体间的关系创造了条件。无独有偶，嵌入性（Embeddedness）的概念模型同样出现在这个领域。“我所谓的‘嵌入性’指的是，不论是个人还是更大的经济体系的经济行动（例如，价格的确定和经济制度的形成），都受到社会关系网络的严重影响”。格兰诺维特演绎了卡尔·波兰尼的概念，而相比之下，泽利泽又将“关系嵌入”进一步改造为文化维度的“关系营造”。^⑤ 她的研究旨趣在于，从理性与情感交织的世界窥探诸如儿童教养、家庭内部交易等问题。家庭中的情感与地位绝非不堪一击，它在现代社会甚至左右了我们的日常经济行为。近些年在国内的家庭社会学研究中，关系视角越来越多地在代际关系分析中受到重视，并与个体化视角形成比较。例如，钟晓慧与何式凝的研究一改往日大众眼中“购房父母”的辛酸印象，为子女添置不动产的行为被认为是建立“协商式亲密关系”的尝试。^⑥ 而同样在学者对“啃老”现象的看法中，“亲子一体”的代际责任伦理在社会转型中得到强化，中国的代际互助传统被再次诠释。^⑦

二、转型社会理论中的家计叙事

上述两种研究路径从各自角度出发，构成了中国家庭研究对转型社会的主流认识，然而，无论是关注家庭形态还是家庭观念的转变，这两种路径之间总是缺少积极的对话与勾连。“家庭研究在学术化道路上举步维艰，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太拘泥于具体的问题清点而疏于对背后的理论假设和价值立场的检讨”。^⑧ 在此形势之下，研究者往往忽略家庭的历史与定位。实际上，在转型社会的认识分野背后，还隐含着研究者们对于家庭本体的迥异理解。近些年来，不少学者发现学界对家庭的定义界定在过

① 参见唐灿：《家庭现代化理论及其发展的回顾与评述》，《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3期，第221页。

② 参见乌尔里希·贝克、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李荣山、范譔、张惠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31页。

③ 参见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洋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43页。

④ 参见沈奕斐：《个体家庭 iFamily：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家庭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79页。

⑤ 参见薇薇安娜·泽利泽、高崇、李兴华：《关联取向的经济社会学家以及如此转向的意义》，《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13~14页。

⑥ 参见钟晓慧、何式凝：《协商式亲密关系：独生子女父母对家庭关系和孝道的期待》，《开放时代》2014年第1期，第155页。

⑦ 参见刘汶蓉：《转型期的家庭代际情感与团结——基于上海两类“啃老”家庭的比较》，《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4期，第165~166页。

⑧ 吴小英：《家庭研究的主义与问题》，《中国家庭研究（第8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

往长期处于混淆境地，因而尝试进行澄清，^①但至今鲜有学者系统地从学术知识生成的角度思考其内在成因。本文认为，解释这种差异，需要我们回到经典的转型社会理论，还原被研究中的家庭形象。

追溯社会理论的传统，卡尔·波兰尼可谓转型社会研究的开创者。在《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中，波兰尼立足于工业革命时代中人的境遇，勾勒出转型社会理论最初的理路。^②近30年来，波兰尼式（Polanyian）的话语在社会科学领域如影随形，其理论工具更被应用于各种研究的具体操作上。诸多社会研究学者继承了波兰尼的思想遗产，先行的研究者已然指出，“市场社会”、“嵌入性”、“双重运动”是其转型理论最为主要的概念构件。^③“嵌入性（embeddedness）”与“双重运动（double movement）”作为动力机制，用以证伪自律的“市场社会”。但与此同时，家庭研究对经典转型理论的探索却尚未深入。应该认识到，波兰尼写作此书的初衷在于阐释人道主义的危机，而这恰恰体现在《巨变》对家计的叙事之上。

（一）家计的意义

《巨变》的主旨是对“市场社会”进行解构。波兰尼认为，牟利交易动机并非人类原初属性，市场制度侵占了家庭在生产领域中的自然法则地位。他的开创性工作在于，带领读者找回前市场逻辑的三个身影：互惠、再分配、家计（Householding）。但遗憾的是，“在日后的转型研究中，互惠与再分配以及市场交易三者被很大程度上提及，家计却被无视了”。^④在文本中，家计的重要性为波兰尼所推崇，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他批评19世纪古典学者对家庭形态的忽视，重新考察了亚里士多德的“家庭”（oikos）观。雅典社会的核心单位是oikos，由父母子女（包括主人所拥有的奴隶）及其居住的宅落以及土地所构成。在此语境下，oikos指住所，也就是人生活的所在地和环境，它的转化意义即是household。^⑤“家庭”（oikos）是与“政治”（polis）相对的概念，而家计即是指家庭生活的运作原则。

在波兰尼的论述中，家计具有两层功能，其一在于维持单个家庭的自给自足，是一种建立在互惠与再分配原则基础上的第三种人类经济模式。

第三个原则在历史上注定要扮演重大角色，我们将称之为“家计”，它在于生产面向人们的使用需要……它与图利动机或市场制度毫不相干。此时的经济组织形式是一个封闭的群体。尽管这个自足的单位是由家庭、聚落等非常不同的实体组成，但其原理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生产及储藏是为了满足团体成员的需要。^⑥

① 目前在中国家庭研究界，唐灿、王跃生等学者先后撰文指出，当前研究中存在对“Family”、“Household”乃至“Home”的混淆，因此“家庭存在”与“家庭观念”，“个体家庭”与“家户”等概念近期被提出，用于指涉家庭内涵的不同指向。参见唐灿：《家庭的定义与政府的责任》，《中国人口报》2012年8月13日；王跃生：《中国当代家庭、家户和家的“分”与“合”》，《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第91~110页。

② 原书标题为“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当前国内主要有两个中译本，分别参见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刚、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本文结合两个译本，以英文原版作为下文引用依据。为方便行文，文中皆以《巨变》指代此书。

③ 参见吕鹏：《社会大于市场的政治经济学——重访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第221~228页；符平：《“嵌入性”：两种取向及其分歧》，《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5期，第141~164页。

④ ChrisHann, Afteride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Gellner, Polanyi and the New Peripheralization of Central Europe, *Thesis Eleven*, vol. 128 (1), 2015, p. 47.

⑤ Cheryl Cox, *Household Interests: Property, Marriage Strategies, and Family Dynamics in Ancient Athe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xiii-xvi

⑥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eacon Press, 2001 (1944), p. 55.

家计的另一个功能，在于规范家庭的组织过程。^①“家计有赖于自治（autarchy）”，尽管其运作空间十分有限，但波兰尼承认它的组织形式可以是多样的。^②埃马纽埃尔·勒华埃杜里曾在《蒙塔尤》中指出，家是权力与反权力的源泉。^③家计不仅局限于父权制的组织构建，它还是一种立足于地缘空间的社会整合力量。在文本中，相关的论述集中体现在一段对市场的描写上。

在典型的地区性市场中，家庭主妇凭借家庭需求购买日常用品，农民、菜贩同样贩卖他们生产的成品，很少受到时间及空间的影响。这种市场是地方生活的附属品。当时所谓的国家实际上只是政治的单位，而且非常松散，它包含了在经济上无数大大小小的自给自足的家庭，以及村落中无足轻重的地方市场……在重商主义笼罩下，新出现的全国性市场不可避免地有某种程度的竞争性，但是占优势的却不是这个市场新要素的竞争性，而是管制的传统特色。自给自足的、为农户奔波的农民仍是这个经济体制之广阔基础……农业现在已经被国内商业——这个相对孤立之市场体系——所补充，后者与仍支配着乡村之家计并行不悖。^④

《巨变》刻画了工业革命前英国家庭的家计过程。一方面，家庭不断拓展其立身的生存空间，诸如“家庭主妇”、“贩卖自家产品的农民”的角色作为区域内的行动者，有效地将城市与乡村、地区性市场与全国性市场相关联。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内各种形式的互动、竞争与分享，体现了家庭的日常生活与外在世界的关联。家计过程涵盖了在市场中四处奔波的养家者，以及区域内的血缘与地缘关系。另一方面，家庭还处在以关键事件为标志的历史过程中。“市场制度”以及“管制传统”在日常生活中动态地缺席或在场，转型社会理论以此为重要依据界定时间进度，并从中观察不同时期的社会主导机制与结构动能。家庭、市场与国家并行其间，家庭的行动与秩序逐渐程式化并发生在时间与空间因素共同营造的背景之中。

（二）家计的沦落：嵌入性与双重运动

波兰尼的理论抽象于历史叙事，一系列事件勾勒出激荡社会中的家庭境遇。其中，“嵌入性”与“双重运动”描述了转型的发生与后果。

一般认为，波兰尼意义上的“嵌入性”指的是市场逻辑先天嵌入在社会关系中，转型来自于前者尝试从后者中脱离出来的努力。在文本中，家庭工业与家庭生产者随着工厂制的兴起而没落，是其中最为生动的案例。在市场冲击之下，个体被迫从家庭中剥离出来成为虚拟商品：自律市场的劳动力。由此，转型的力量越过家计的过程，从外部世界开始直接影响了个体的生命历程，“人类社会成为经济体制的附属品”。

市场经济的极端人工化扎根于生产过程本身，凭借买与卖的形式而组织起来。在重商主义的社会，生产是由富裕的商人所组织的，此时是“分包（putting out）”的时期。商业资本家提供原料给家庭工业（domestic industry）并控制生产的过程，视之为纯粹的商业企业。这时的工业生产已处于

① Ann Firth, Fromoconomy to 'the Economy': Population and Self-interest in Discourses on Government, *History of Human Sciences*, vol 11 (3), 1998, p. 21.

②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eacon Press, 2001 (1944), p. 59. 《巨变》文本中将“autarchy”译作“权威”。

③ 参见埃马纽埃尔·勒华埃杜里：《蒙塔尤》，许明龙、马胜利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34页。

④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eacon Press, 2001 (1944), pp. 66-70.

商人之有组织的领导下……如果生产失败了，家庭工业者就会暂时失业并蒙受最大的损失。^①

在家庭叙事的层面，“脱嵌”可以被理解为，传统家庭的政治与经济功能依托于教区的管制，却在市场的冲击下脱离出来，家计的破产使人们流离失所。乡村的破败景象引发波兰尼对“安居(habitation)”的重视。他在文中写到，重商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无视人民日趋恶化的生存、居住条件，这引起了保守势力的警觉，人们想要找回现行政权之下的道德与经济平衡。于是，当自律性市场对社会形成冲击时，反市场力量也随之启动，这就是波兰尼所论述的“双重运动”。他认为，在这个时期，英国基层社会诞生的《斯品汉姆兰法案》(Speenhamland laws)，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波兰尼在书中指出，这一法案最早建立了家庭津贴制度，确立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最低生活标准的正当性。其独特之处在于，不同于1601年《济贫法》的劳役得食制度，《斯品汉姆兰法案》主张，“只要一个人的工资低于家庭收入的补贴标准，即使他有工作，也可以得到救济”。^②

1662年的《斯品汉姆兰法案》加强了都铎王朝及斯图亚特王室承袭下来的家长制劳动组织……当一加仑大小的面包需要花一先令时，则每一个穷苦及勤奋的人必须有三先令的收入以维持生计，不论这是不是他自己或他的家人的劳动所得的，或是从贫民津贴得来的，并且为了养育他的一家妻小，每增加一人需要增加一先令六便士。^③

反市场力量的介入与乡村权力秩序的普遍瓦解紧密相连，“双重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将家庭视作各方势力角逐的战场。依据市场逻辑侵入的程度与后果，保卫社会的力量启动了对破产家庭的支持。波兰尼对《斯品汉姆兰法案》的考察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学界：呼吁尼克松政府出台“家庭援助计划”(Family Assistance Plan)。^④而除此之外，波兰尼也观察到了家庭福利政策的另一个面向。在对《斯品汉姆兰法案》的后续思考中，他发现家庭津贴的引入在拯救教区的同时，还有效地维护了原先的父权制建构。^⑤破落的家庭在外力影响下得以喘息，乡村的传统秩序被重新维护，也促使人们重新认识家庭内部的秩序与不平等。

综上所述，波兰尼将古典的家庭形态放在社会变迁的情境中加以观察，用以解释转型社会中人道主义危机的成因。通过考察与分析《巨变》文本，我们发现一种关注家计的叙事线索：第一，家庭原本是社会整合的重要途径，家计具有不同于市场逻辑的自给自足功能。与此同时，家计还是一种区域性的自治形式。第二，当引入动荡的市场变量之后，市场逻辑尝试从社会关系中脱嵌，自律市场使家庭淡出生产领域。家庭中的人势必被要素化为劳动力商品，从而脱离家庭。第三，市场逻辑对家庭侵入之时，秉承社会保护原则的国家保守势力并行而来，对家庭施以经济与道德的支持。外部力量对家庭的组织形式进行强势介入，个体由此回归到家庭中来。从上述线索可以看出，转型社会挑战了家庭自发的社会整合能力，而伴随传统家庭的瓦解，个体命运与国家—市场显隐的力量由此直接联系起来，成为整体性命题。波兰尼《巨变》隐含着一种悲观的论调，家计沦落意味着家

①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eacon Press, 2001 (1944), p. 77.

②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eacon Press, 2001 (1944), p. 83.

③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eacon Press, 2001 (1944), p. 82.

④ Fred Block and Margaret Somers, "In the Shadow of Speenhamland: Social Policy and Old Poor Law,"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31 (2), 2003, p. 284.

⑤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eacon Press, 2001 (1944), p. 83.

庭自发的生命力消失，它从此被人们看作为一种静态的社会现象。

三、家庭的再制度化与命题分离

《巨变》写作于1941年到1942年凯恩斯主义盛行的美国，作者亲身体会到在过去十年罗斯福新政如何帮助社会回归正轨。迈克尔·曼指出，波兰尼以社会自我保护抵御市场的破坏性影响的理论主张，显然切合了新政的内容。^①然而在一段时间内，《巨变》展现的论述却一直为学界所忽视。70年代，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政治经济学强势崛起，福利国家政策日渐式微让渡出了主流学术话语。而与此同时，随着这种意识形态的深入发展，全球化引发的危机逐渐暴露出来。不少学者开始认识到波兰尼对资本主义世界剖析的意义。沃勒斯坦将之视作他的“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灵感之源。^②一方面，他将波兰尼论述的国家—市场的隐现与个体命运之间的冲突，归因于日益复杂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另一方面，他还继承了波兰尼对于制度的看法，强调制度诞生于转型的社会环境中，并将制度化视作历史发展的一种趋势。就家庭而言，无论是面对封闭的小体系还是世界帝国，不断提升的生产与分工水平被视为现代家庭在转型社会中展现出来的重要特征。沃勒斯坦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促使雇佣劳动以及亲密关系发生变革，家庭不仅被设定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最主要的制度环节，同时也是展示个人生活真实状态的场所。^③家庭正面对社会的又一次转型，学界重新构建波兰尼的家计概念，指出当代家庭正在经历一种再制度化过程：即为了自身的维持与发展，家庭正衍生出程式化的实践方式，并作用于其内外两方面的环境与主体上。

当代家庭再制度化的一个表现在于，新自由主义重新将货币关系带入家庭，商品化的雇佣劳动成为家庭的日常所需，人们在思考依靠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生活团体如何应对外部环境带来的挑战。^④迈克·道格拉斯复兴了波兰尼的概念，他认为当代社会的家计（householding）是一种建立与维持的连续性过程。立足于家庭成员的生命周期与行动策略，家计被视作家庭延续、变化以及对外部世界的现实反应，而非仅是静态的经济社会现象。^⑤全球化对社会分工产生深远影响，家庭需要对外部变迁的环境作出必要的反应。相关经验研究分析了中国农村家庭流动问题。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编织相互依赖和互惠的跨地域支持网是当前农村家庭的一种策略，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留守老人的生活质量。^⑥从这个意义上看，当代社会的家计过程具有一定的指向性：一方面，家计立足于外部环境的变迁，转型社会要求区域内的家庭对此进行反应，策略性的回应旨在将家庭成员的福利最大化；另一方面，家计过程还整合了家庭所拥有的各种社会资源过程，利用劳动分工的方式，发展出了一系列程式化的社会参与模式。

当代家庭再制度化的另一个表现在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赋予私人生活以独立性与纯粹性，

①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三卷）——全球诸帝国与革命 1890—1945》，郭台辉、茅根红、余宜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29页。

② 西达·斯考切波：《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封积文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

③ Immanuel Wallerstein, Household Structures and Labor-Force Formation in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in Joan Smith, Immanuel Wallerstein and Hans-Deiter Evers, eds., *Households and the World-Economy*, Beverly Hills: Sage, 1984, pp. 17~22.

④ 俞金尧：《欧洲历史上家庭概念的演变及其特征》，《世界历史》2004年第4期，第21~22页。

⑤ 参见 Mike Douglass, The Globalization of Householding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in Pacific Asia, *Philippine Studies*, vol. 55 (2), 2007, pp. 157~181; Mike Douglass, Global Householding and Japa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Rise of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In G. Vogt and G. S. Roberts, eds.,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 Japa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Germany: Iudicium press, 2013, pp. 1-14.

⑥ Jieyu Liu, Ageing, Migration and Familial Support in Rural China, *Geoforum*, vol. 51, 2013, pp. 305-312.

但其中的权力关系却使之愈发复杂，并衍生出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家庭正在尝试重新塑造内在的生活秩序。一个针对菲律宾劳工家计状况的研究指出，海外务工的女性担负了赚取面包的重任，进而挑战了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她们不仅带回工作收入与生活方式，还进一步制定出照料幼儿与老年人的家庭分工细则。^①塔玛拉·杰华从经济、文化以及社会三个层面分析家计过程。在针对中国宁夏的留守妇女的研究中，她发现农村家庭在迁移行为上受到两方面影响：其一是复杂的社会经济因素长期作用其间；其二便是家庭内部存在的劳动分工以及相关的权力斗争。^②成员间互助以制定生活策略对于家庭的延续具有积极作用，但家计过程并不仅仅是为了应对生存压力，家庭的生活策略还包含了成员之间的博弈与资源分配。当前的学者愈发认识到，在家庭的变迁轨迹背后，更多的非经济性以及内在驱动性因素在发挥作用，家计过程在一定程度上由情感与理性共同作用。波兰尼提出的“安居”议题不仅涉及政府给予家庭以经济支持的程度，还应该加入诸如代际差异、性别议题乃至族群文化的综合考量。

综上所述，面对当前转型带来的挑战，家庭的再制度化建立在两方面的不断调适之上：对外应对挑战、对内塑造秩序。依据这个发展趋势，学者们重新构建了家计的意义，家计不再仅仅是墨守成规的政治经济原则，它如今还是一种兼容维持与冲突的鲜活过程。本文认为，正是学界对家计的重构造成了家庭研究对于转型社会的两种不同认识。在文章第一部分所叙述的两种主流认识中，我们能够发现：其一，面对国家治理与市场逻辑的交替展现，相关研究不仅观察到当代家庭被施加改造的历程，与此同时，研究者们也认识到家庭作为一种升级行动者，投身于变迁情境下的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之中。家庭的外向制度化过程促使学界反思传统父权制的演变、国家话语对市场化进程的后果，转型社会的家庭研究聚焦于复杂的外部世界。这造就了家庭研究“依托—冲击”的转型社会认识。其二，个体从传统家庭与亲属制度中出走，然而在直面社会转型中的风险后，又要返回家庭寻求资源与安全感。在亲情给予的力量与支持的同时，这种回归使家庭重新塑造了成员的身体、知识以及关系。家庭的内向制度化过程启发相关研究基于个体化的视角，考察现代人对家庭之道德与价值的观念转变，聚焦于私人生活的变革。这构成了家庭研究“脱离与回归”的转型社会认识。

就此而言，家庭研究对于转型社会的认识分野如是发生：首先，面对家庭内外环境的变革，研究者们集中探讨了转型社会在如今的特征，这对应在家庭研究上出现了命题上的分离。此后，家庭面向外部世界与内在秩序的再制度化趋势，使得分离的命题形成独立探讨的空间，进一步构建出“国家—市场与家庭”、“个体与家庭”两个研究路径。相较于波兰尼的整体性命题，分离的研究命题改变了本土化学术研究开展的方式与角度，进而造就了中国家庭研究对于转型社会的不同认识。

四、结论

本文指出，中国家庭研究对于转型社会存在着两种彼此疏离的认识：“依托—冲击”与“脱离—回归”。针对认识上的分野，作者尝试分析这一现象背后的知识生成原因。首先，文章追溯并考察卡尔·波兰尼的经典社会转型理论，展示了《巨变》文本对于家计过程的描写，以此勾勒出变革时代

^① Emma Porio, Global Householding, Gender and Filipino Migration: A Preliminary Review, *Journal of Philippine Studies*, vol. 55 (2), 2007, pp. 212–242.

^② Tamara Jacka, Migration, Householding and the Well-being of Left-behind Women in Rural Ningxia, *The China Journal*, vol. 64, 2012, pp. 1–22. 亦可参见塔玛拉·杰华：《理解“留守者”境遇的一个替代框架》，中国农业大学“农政与发展”讲座，http://cohd.cau.edu.cn/art/2012/10/8/art_8574_161066.html, 2012年12月8日。

的家庭形象。然后，通过探讨 20 世纪 70 年代新自由主义下波兰尼研究的发展，文章指出学界面对于家庭的外部世界与内在秩序转型，进而重构家计意义的努力。本文认为，正是上述过程造成了当前家庭研究对于转型社会认识的分野。研究中发现：

第一，当前家庭研究的两种转型认识之间缺少对话与勾连。无论是国家—市场对于家庭的意义，还是个体面对家庭的态度，研究者往往忽略家庭的历史与定位。回到经典的转型社会理论，还原研究中的家庭形态，有助于我们探索并分析现象背后所隐含的对于家庭本体的迥异理解。第二，卡尔·波兰尼的经典转型社会理论具有启发作用。《巨变》文本中阐释的家计研究过程，引导我们认识到家庭的多重内涵属性及其所处的转型时空的意义。“嵌入性”与“双重运动”的动力分析机制呈现了家计的沦落。转型社会挑战了家庭自发的社会整合能力，而伴随传统家庭的瓦解，个体命运与国家—市场的力量在研究命题上联系为一个整体。第三，后继学者对于波兰尼的继承更加强调复杂环境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重构了家计在当代社会的意义。家庭再制度化趋势将外部环境与内在秩序有效分离，形成了“国家—市场与家庭”、“个体与家庭”两个相互独立的研究命题，各自延伸出知识生成的认识路径。家庭的外向制度化造就了家庭研究对于转型社会的“依托—冲击”认识，而家庭的内向制度化构成了家庭研究对于转型社会的“脱离—回归”认识。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 2016 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周勤勤

Reconstructing Householding: The Approaches of Family Studies in the Transitional Society

Liu Xinyu

Abstract: The meaning of “transitional society” for family studies is long neglect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 For a long time, family studies in China have two separate understandings for transitional society. One of them focuses on the influence and support of state and market for families. The other emphasizes on the breakaway of individuals from families and the return of them to families. Retrospecting and reviewing Karl Polanyi’s classic theory on transitional society, this paper finds out a narrative clue about householding in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ecause of the disintegration of householding, individual fate is associated with the state and market, and this association forms an integral research proposition. The rise of new liberalism in the 1970s l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outer world and inner order of families, and thus families were institutionalized again. Researchers focused again on householding, and their propositions were gradually separated into two areas: “state-market and family” and “individual and family”. It is the reconstruction of householding that causes the dividing of the understandings of family studies about transitional society.

Keywords: transitional society; family studies; Karl Polanyi; householding